

三都岭隧道与山道旧事

宋维远

瑞城老地方系列
11

三都岭是市区锦湖街道与塘下镇毗邻的一座小山头。此山古代属瑞安三都,故以“三都”来作岭的名字。三都岭隧道南接瑞安市区,北通塘下镇,直达温州市区,自古以来就是瑞安城北向捷径。

说“捷径”,是因为从公元14世纪到20世纪的600多年中,瑞安城北出的道路,无论步行、坐船还是乘汽车,都要先出南门或东门,绕过横亘瑞城北面的集云山,再折向北行。而如果从瑞城直接北出,越过集云山便可少走一段弯路,所以称之为“捷径”。那么,三都岭就是翻越集云山这条捷径的咽喉。



三都岭一带的古驿道遗迹

温瑞邮驿中的咽喉

人们历来都说,瑞安城地理环境虽优越,也有美中不足。说优越,是城西南有飞云江环绕,不仅为人们提供舟楫之利,且可调节气候;城北和东北有集云山横亘,是瑞城北面天然屏障,冬拒寒风,夏挡台风;加上东濒大海,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美中不足的是,北面通温州的直达道路被山所阻。公元3世纪前期建立罗阳县治时,县城与温州(永宁县)城的邮传驿道只能翻越集云山,三都岭山道正是此山较低的隘口。

据清嘉庆时编的县志《邮传》称:明洪武三年(1370),废掉境内原有的马厓、仙居、寺庄、梓岙和丽塘5个铺舍(供

官员和驿卒住宿的处所),新辟莘塍、岑岐、仙岩、帆游4个铺舍。就是说,洪武三年前瑞安与温州间邮传是出北门经马厓铺翻越三都岭到仙(新)居,经寺庄、梓岙、丽塘各铺与永嘉县驿路衔接。洪武三年后,因这条路翻山越岭不方便,改为出东门,经莘塍、岑岐、仙岩、帆游(属瑞安)诸铺后与永嘉县驿路连通。该线虽然路程长一些,但全是平原,且沿温瑞塘河可坐船,也可骑马。

那么,为什么直到洪武三年才改道呢?因为温瑞塘河在唐朝中期才南北贯通,会昌年间引温州三溪水灌河,才有满足行船需要的水量。但塘

河东岸的原海堤一线,还要架设配套的桥梁,经过两宋朝的相继造桥,加宽路面,入元后又遭破坏,直到明初修复,才开辟成驿路官道。可见,明初以前的漫长时期,三都岭一直是温瑞间主要通道的咽喉,就是明以后塘河一线驿道沟通了,也还有不少人图近便快捷,仍抄近路从此翻山而过,只是后来行人慢慢稀少,才逐渐从“热闹”变为“冷落”,被人们淡忘。

而附近居民,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地下党的交通员们还以此路作为瑞安东区与城区后岗底联络站的一条安全、便捷的交通线。

甬台温高速重启三都岭旧道

20世纪中,有两条公路经过瑞安,一条是1937年通车,又于次年为了阻止日军入侵而毁坏的永瑞平公路,只通车了几个月。另一条是1955年5月在1937年公路的路基上重新建造

的104国道,此路基本上与洪武后驿路线相近,也是绕集云山东侧,到东门和南门入城。

21世纪初,瑞安新添甬台温高速公路,路基大体与洪武前驿路重叠,主要是出瑞城

北门,穿越三都岭隧道,直通温州。这条北向捷径经过600多年的冷落后,重新被唤醒。到此,瑞安城地理环境北出无门的“美中不足”才算得到完善。

日本侵略军曾翻越三都岭攻占瑞城

1942年上半年,日本侵略军野心勃勃地向南太平洋发起进攻,在华日军急于打通华东、华南通道。侵入浙江的日军攻占衢州国际机场后,于当年6月南下青田,7月初分别派飞机对温瑞两城进行侦察、轰炸。7月13日,占领温州之日军一支部队500多人

携大炮、机枪在飞机掩护下南侵至丽岙、沈岙,不再南下却突然于中午折向西面,从新居翻三都岭到沙塘底,然后一部分分进至愚溪、河埭桥,一部分经西岙占横山,一部分占礁石;炮兵则在万松山向瑞城发炮,从飞云江口入侵的日兵舰也炮轰南北岸码头,当天下午

瑞城陷落,三四天后因给养不继退回温州。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侵略军从温州南下进攻瑞安城,为什么不按常规沿温瑞塘河走平地直攻,却怎么会知道三都岭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山道可以偷袭呢?肯定是事前他们早已盯上三都岭山道。对我国这么一条小山道他们尚且如此清楚,可见侵华野心是蓄谋已久了。

今天,那个一向为日本二战战犯招魂的安倍,当了日本首相后,不但对日本侵华罪行毫无悔改之意,反而企图篡改日本侵华历史,甚至连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也想遮掩,这难道不值得我们百倍警惕吗?这也正是三都岭再一次给我们提出的刻骨铭心的警示!

隋唐瑞安农业的进步

俞光

隋代、唐前期我国实现了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以后,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安史之乱后我国经济走向衰败。与此同时,隋朝南方经济实力已经超过北方,唐代南方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这些为瑞安经济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土地开发从山区向平原拓展

隋唐前瑞安的山区经济发展尚较落后。到了隋唐时期,瑞安的土地区域则经历了先从山区、半山区再到平原的拓展过程。

从唐代移民的迁入地分析,瑞安的土地区域最初主要在今属泰顺、文成县的山区。唐天宝之后,废均田制,大批农民失去土地,除荫附于地主田庄、寺院外,部分农民被迫入山开荒种粮。

林鹗在《清光绪〈泰顺分疆录〉》序说:“泰顺唐以前僻在荒服中,多老林供郡国材用而已,实闽括间瓯脱也。至唐,始有山民烧畚辟壤,渐兴赋役。及唐末之乱,赋烦役重,民不堪命,流亡入山者愈多,则百落千村皆武陵之桃源矣。时藩镇从衡,强辟朝官为佐,於是闽越有志之士挈家入山,请於刺史,烈山导泉,垦田均赋,定界立户,始有义翔乡五都岭十二里,归仁乡三都六里之目……前后入山占籍者凡十八大姓:义翔乡如茗岗夏、庠村吴、包坑包阳包、箬阳毛、池村池、大住左窟方、罗峰董及宋、南阳江、仙居木棉徐、葛阳陶……开山至今八九百年,子孙尚多聚族而居。”当时义翔乡属安固县,归仁乡属横阳县,文中详细介绍了安固、横阳先民开发今泰顺山区的经过情况。

随着今瑞安市境内东部平原的逐渐成陆,唐代瑞安土地开发的重点渐渐由今属泰顺、文成县的山区向今瑞安市山区、半山区及东部平原转移。从唐代自温州境外迁入今瑞安市的迁入地分析,先是属半山区的大南许峰亦有人迁入,可见这里土地开始开发。而《瑞安市地名志》称:湖屿桥,“据传昔西南系一湖泊,湖中南有小屿,故名湖屿。唐末建了一座桥,遂名湖屿桥。”这时,山区的湖屿桥已有人居住,周边土地也开始开发。随后县城、城郊横山,飞云独峰等平原地区都有人迁入,表明这里土地开发渐成热点。

水利的兴修

隋唐时期,在开发土地的同时,水利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各级政府比较重视水利事业,如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设有专门管理水利的机构和人员,各地的水渠和斗门置长一人,专管用水和设施的维护。州县每年派员检查,视其经管水利的好坏,田畴的丰歉,予以赏功罚过。唐朝还制定了严密的水利灌溉法规——《水部式》,对水利设施的设置、用水时间、用水先后、用水量、人员配置、设施的维护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对于减少争水纠纷,合理用水,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推

动瑞安水利由山区向半山区、平原拓展,特别是随着温瑞平原的逐渐成陆,南塘也开始筑。

南塘兴建始于唐中期、唐后期形成。《瑞安市水利志》指出,“飞云江北岸,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堤塘是始建于中唐的城东石塘瑞安岸段。从瑞安城东门外至帆游,长20.40千米,再向北伸与瓯海的南塘相连接,在晚唐时期进行过重建。”南塘的兴建为瑞安东部平原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农业生产的进步

隋唐时期,瑞安的水稻生产从人拉犁耕转变到牛拉犁耕,这是农业耕作方式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明万历《温州府志》指出,唐总章二年(669)六月大海溢,永嘉、安固二县溺杀“牛五百头”。这有力证明了当时温、瑞已经普遍推行牛拉犁耕。从人拉犁耕转变到牛拉犁耕,不仅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进一步提高犁耕的质量。

与此同时,犁耕的工具也有重要改进。唐初,我国南方出现一种短而轻便的曲辕犁。同以前的步犁相比较,曲辕犁有三处重大改进:即直辕改成了曲辕,增装了犁评和犁壁。曲辕比直辕灵活,便于操作。犁评用以控制犁箭,可深可浅。犁壁用以将翻起的泥土推到一旁,以减少阻力。武金铭等著《中国隋唐五代经济史》称:“由于曲辕犁灵便省力,可由单牛牵引,适合水田耕种,因而在江南地区更是广泛应用。我国古代的耕犁,发展到曲辕犁,已基本定型。”瑞安亦是如此。

瑞安气候暖和,日照期较长,再加上隋唐时期瑞安社会比较安定,农民可以安心生产,水利建设的开展,使农田灌溉有所改善,致使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伪越外纪》称:“稻一年再熟,今浙江温州稻一岁再种,广东又有三种田,地气暖故也。”唐末乾宁二年(895),董昌据越州,史称“伪越”。说明其时温州地区水稻已能一年两熟。当时的稻岁再熟是指间作双季稻,这种种植技术能够大大提高农作物的复种指数。《中国隋唐五代经济史》认为,唐代我国北方不少地方“可以二年三熟”,而“南方通行二年三熟制,有的地方可以一年二熟”。不过,当时由于受水利灌溉等条件的限制,间作双季稻为试种阶段,尚未全面推广。

隋唐时期,除瑞安的水稻生产有了重大进步外,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渔业副业也有所发展。《隋书》云,隋代豫章“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织,亦有夜流沙而旦成布者,俗呼鸡鸣布。新安、永嘉、建安……其俗又颇同豫章。”《新唐书》也说,唐代温州永嘉郡“土贡布、柑、橘、蔗、蛟革(鲨鱼皮)。”《元和郡县志》记载,元和年间(806—820),温州“贡蛟(鲨)鱼皮三十张”。这些都说明了隋、唐时包括瑞安在内的永嘉郡麻、柑、橘、甘蔗的种植和养蚕、捕鱼等业都比较发达,产品品质优良,从而上贡皇家,成为其时温瑞经济中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线。

